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 进程的总结与评价

李 文

[摘要] 与国际标准模式相比较,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略低于经济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这一现象是中国独特的工业化道路造成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是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转换的客观需求,而且直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一直保持这一趋势。

[关键词] 中国城市化进程 国际标准模式 产业结构 就业结构

[中图分类号] F29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4952(2002)05-0041-10

城市化是工业革命以来人口就业结构伴随产业结构转换发生相应变动的结果,城市化水平是现代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无论一个国家城市化如何起步,其城市化进程一般都经历三个阶段,即起始阶段、加速阶段和完成阶段,这当中加速阶段各国城市化演进的差异最为明显,多数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结构比较单一、农业非常落后,但其城市化却有了畸形的超前发展;与这些国家相比较,中国的城市化进展却相对滞后,在一段较长的历史时期与各国城市化演进的一般趋势显示出较大的差异性。本文将结合国际标准模式对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做出总结和评价。

一、引言

城市化的推力、拉力和制约因素

所谓城市化便是伴随经济增长城市数量增多和城市人口比重上升的过程。首先,城市化是工业化推动的结果,即工业和商业发展形成聚集经济、进而产生对农村劳动力的持续不断的需求;其次,城市预期收入远比农村要高,生活条件和个人发展条件比农村优越,因而吸引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再次,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将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排挤出了农业生产领域,于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不得不去非农业领域特别是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可见,“在一个连续均衡的国民经济中,城市化可能表现为因果链条上的各类事件的最后结果,以导致工业化的贸易和需求的变化为开端,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就业的平缓移动为结果。但是……从农村向城市定居迁移的发生早于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并越来越由期望的收入所决定,而不是现在的工资。因此,除了把城市化看成是生产结构变化的结果以外,还必须把它看成是某种程度上分散的发展过程。此过程受未来收入和对就业的期望,以及政府支出的分配和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1]此外,城市化也受到了政府人口流动、迁移和城市就业相关政策的制约,在我们分析中

[收稿日期] 2002-08-15

[作者简介] 李文,1963年生,博士,编审,当代中国研究所,100009。

国的城市化问题时必须特别强调这一点。

关于国际标准模式

上段文字中的引文引自世界银行前任发展政策副主席霍利斯·钱纳里(H. B. Chenery)和他的同事莫尔塞斯·塞尔奎因(M. Syrquin, 亦被译作塞尔昆)所著的《发展的格局(1950~1970)》一书。该书系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年间100个经济增长程度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统计资料,分析、总结并描述发展过程中的一般变化趋势。这一研究成果问世后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并被此后的经济学文献广为引用,在一些国家的政策实践中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世界银行在评价这一研究成果时指出:“严格地说,结构性特点,如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与人均收入这个主要的‘解释性’变数是在统计模式中不加解释的基本经济过程的联合结果。因此,不可能推断因果关系。尽管如此,这些研究产生的标准格局提供了有用的统计基准,使人们可以进而探讨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2]我国发展经济学家杨敬年教授在为这部书的中译本作的序中也指出:“这些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平均变动趋势,从长期看方向是正确的,可以供发展中国家借鉴,有利的趋势予以发扬,不利的趋势(比如城市化及收入分配方面)则设法加以避免。”本文便是以钱纳里等人总结的国际标准模式为参照,分析并描述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轨迹,并从上述诸多因素中揭示这一轨迹与各国一般变化趋势相背离的原因。

设立城市的标准

还有一点,那就是各国设立城市的标准并不一致,人口较少并且人口密度较小的国家设市标准一般也比较宽松,可能是个两三万人的居民点就可以设立为城市,多数国家城镇不分,美国将1万以上人口的居民点都称之为市,有的国家还把标准降到5000人,联合国的统计则以2万人口为标准;而人口较多并且人口密度大的国家设市标准相对较高,如在中国3万~5万人口的居民点也就只能设个镇。目前中国使用的标准是:2万~10万人口为城镇,10万~20万人口为小城市,20万~50万人口为中等城市,50万~100万人口为大城市,100万以上人口为特大城市。下文的分析除非特别注明都是只限于城市,不包含镇,因为在中国城镇居民还是以农业人口为主体,或者说是一种过渡中的城市人口。

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城市人口比重和城市数量的变动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城市化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只有一成多一点,城市数量只有136个。此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全面加快,特别是由于50年代末期的“大跃进”,城市化率迅速由1952年的12.46%提高到1960年的19.76%,城市数量也由157个增加到接近200个。但是随之而来的便是一个大落的过程,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央政府陆续撤销了52个城市,动员了近3000万城市人口(相当于当时城市人口的1/4以上)返回农村,于是,尽管又陆续新设了一些城市,1965年的城市数量还是比1960年减少了30多个,城市人口比重也降低了近2个百分点。此后中国的城市化便进入了一个相对停滞的阶段,十年动乱期间,不但农村人口很少能够迁入城市,而且有上千万的城市知识青年和上百万的机关干部反向流入了农村,所以一直到改革开放的前夕无论是城市人口比重还是城市数量都没能恢复到1960年的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开始提速,一方面大批插队知青和下放干部落实政策回到城市,另一方面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以后政府对农村人口的超经济

强制明显松弛，因而在上述三大动力的作用下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逐年增多，城市数量几乎每过十年就要增加 200 多个，城市人口比重也迅速由 1980 年的 19.36% 上升到 1990 年的 26.41% 和 2000 年的 36.09%（参见表 1 和图 1）。

表 1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和城市数量

年份	城市化率 (%)	城市数量 (个)
1952	12.46	157
1955	13.48	165
1960	19.76	199
1965	17.98	168
1970	17.38	176
1975	17.34	185
1980	19.39	223
1985	23.71	324
1990	26.41	467
1995	30.00	640
2000	36.09	663

关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城市化率走势

2000 年 36.09% 的城市化率是根据该年年底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到的实际城市人口数字测算的结果，此前由农村流入城市并且实际已在城市就业、生活的人口因未取得城市户口仍被统计为农村人口，因而统计部门公布的城市人口比重明显偏低，如 1999 年的城市人口比重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只有 30.89%，尽管近年城镇户籍制度开始松动，但无论如何城市化率也不会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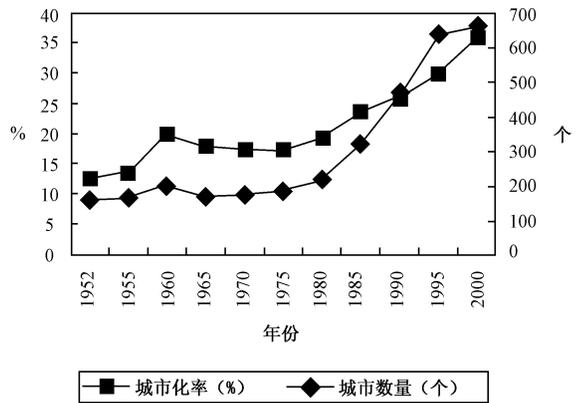


图 1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之内就多出 6~ 7 个百分点。所以过去不少学者认为在公开的城市化率之外还有一个隐性的城市化率。据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的研究人员测算，从 1982~ 2000 年的近 20 年，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口估计为 2.05 亿人。其中，80 年代约为 6510 万人，年均 651 万人；90 年代约为 1.4 亿人，年均 1400 万人。“九五”时期，从农村向城镇转移的人口超过了 1 亿人，年均近 2100 万人，明显多于“八五”时期。在过去的 10 年间，我国有 6790 万人口实现了户口的“农转非”，与同期从农村向城镇转移的 1.4 亿人口相比，户口“农转非”明显滞后于人口“农进城”。^[3]可见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城市化率走势实际上并不像图 1 所示的城市化曲线上升的那样陡峭，与国外作比较研究时可将 80 年代的城市化率统计值每年累加 0.6 个百分点，将 90 年代的城市化率统计值每年累加 1 个百分点，这样也许更贴近实际。

三、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国际标准模式的比较

各国发展的实践证明，城市化与经济发

展水平特别是工业化水平有较强的相关性，或者说前者是后者发展的自然结果，钱纳里和塞尔奎因对此有过经典性的总结。那么，与国际标准模式比较，中国的城市化具有哪些特点呢？

从经济发展水平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人均 GDP 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最主要的指标，钱纳里和塞尔奎因提出的国际标准模式

所使用的经济发展指标正是 GDP 的人均占有量而不是它的总量。但是国际上普遍认为中国公布的 GDP 数字存在严重低估现象, 如 1975~2000 年按 PPP 法测算中国的人均 GDP 水平比官方公布的数字要高出 0.5~3.6 倍。不过按 PPP 法测算的 GDP 水平可能太高了些, 而且以此为标准进行国际比较还需要将国际标准模式中的人均 GDP 数字也换算成 PPP 数字, 换算过程比较复杂。简单易行的做法是将现价 GDP 美元按照相应的平减指数换算成国际标准模式所使用的 1964 年美元或 1980 年美元。国际上比较保守的估计是认为中国官方公布的 GDP 数字比其实际水平低估一半以上, 我们假定剔除虚增成分后因统计遗漏和价格低估造成的实际 GDP 出入在 30% 左右, 据此对世界银行或其他国际经济组织公布的中国 GDP 数字进行调整, 然后将调整后的数字分别换算成 1980 年美元和 1964 年美元以便于同表 3 所示的国际标准模式进行比较。参见表 2。

表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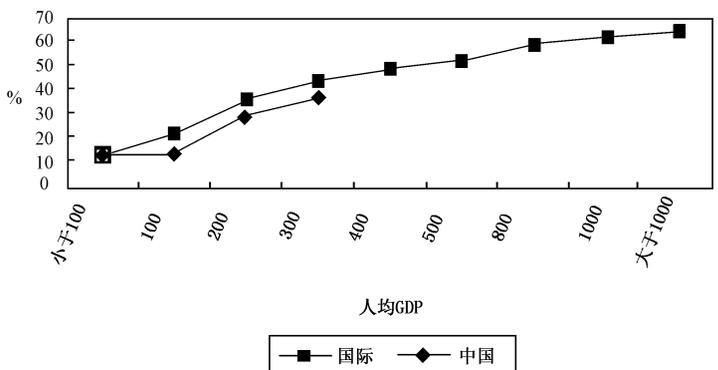
中国的人均 GDP

单位: 美元

年份	现价 GDP	经过调整的 GDP	1980 年美元	1964 年美元	PPP 法 GDP
1952	—	—	—	—	—
1955	—	—	—	—	—
1960	92.71	120.52	162.86	131.11	—
1965	96.10	124.93	152.35	122.48	—
1970	110.26	143.34	170.64	137.83	—
1975	174.38	226.69	263.59	211.86	273.41
1980	204.34	265.64	265.64	214.23	465.00
1985	288.06	374.48	314.69	253.03	839.22
1990	310.18	403.23	237.19	191.10	1400.48
1995	578.12	751.56	247.22	199.35	2681.39
2000	848.00	1102.40	355.61	286.34	3906.89

说明: 现价 GDP 和 PPP 法 GDP 系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的统计数字, 采自中经网《世经年鉴》(<http://lib.cei.gov.cn/index/qiyeh.htm>), 其中 2000 年的现价 GDP 取自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该年的 PPP 法 GDP 系笔者根据上年的数据推算而来; 经过调整的 GDP 是现价 GDP 乘以 130%; 1980 年美元和 1964 年美元是根据 GDP 平减指数换算而来, 2000 年的平减指数是笔者根据 1999 年的指数推测出来的。

从根据表 1、2 和 3 绘制的图 2 来看, 按 GDP 水平衡量, 与国际标准模式相比,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在人均 GDP 低于 100 美元时与国际标准模式基本处在同一水平, 此后与国际标准模式的走势出现了一定的差距, 但差距并不大。不过从表 2 可以看到, 按平减指数换算成 1964 年美元后 1990 年和 1995 年的人均 GDP 水平低于 1980 年和 1985 年的水平, 甚至低于 1975 年的



数据来源: 根据表 1、2、3 绘制。

图 2 按 GDP 衡量的中国和国际标准模式的城市化水平

水平。如按 1975~ 1985 年的人均 GDP 水平衡量, 则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比国际标准模式落后 15 ~ 20 个百分点左右。但在还没有对 20 世纪 90 年代的人均 GDP 数字低于 80 年代 (包括 70 年代后半期) 的原因做出合理的解释之前, 我们还不能据此得出按人均 GDP 水平衡量中国的城市化率严重偏低的结论, 还需要结合工业化水平作进一步的考察, 因为从国际经验来看一般来说城市化主要是工业化推动的结果。

从工业化水平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如果以工业化水平为基准、对中国与国际标准模式相对应的城市化水平作比较, 则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确实存在巨大的差距。

表 3 国际标准模式的 GDP 和城市化、工业化的关系

人均 GNP (1964 年美元)	城市人口 占总人口%	制造业增加 值占 GDP%
小于 100	12.8	12.5
100	22.0	14.9
200	36.2	21.5
300	43.9	25.1
400	49.0	27.6
500	52.7	29.4
800	60.1	33.1
1000	63.4	34.7
大于 1000	65.8	37.9

我们以第二次产业的比重近似地表示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 把中国的数据 (参见表 1 和表 4) 与表 3 所示的国际标准模式作比较。我们看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 我国的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同国际标准模式是比较接近的, 当第二次产业的比重为 20% 时城市化水平为 12% 以上。但是当第二次产业上升到 40% 以上时, 城市化水平尚停留在不足 20%, 而此时国际标准模式的城市化水平已接近 70%。差距就是这样拉开的。如果以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来代表工业化水平, 那么工业化初期的 1952 年, 我国的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 5.1 个百分点; 其后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 两者的差距不断扩大, 至 1978 年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 26.4 个百分点。而按国际标准模式城市化水平要高于工业化水平, 具体表现为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 城市化随工业化而加速推进, 且

资料来源: 霍利斯·钱纳里、莫尔塞斯·塞尔昆: 《发展的格局 (1950~ 1970)》,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8 年版。

城市化的速度会超过工业化的速度。与此比较, 如图 3 所示, 我们看到中国的发展是倒过来了, 工业化推进的速度太快了, 而城市化推进的速度太慢了。图 4 显示了同样的走势, 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比值国际标准模式一直大于 1, 而中国一直小于 1, 且从曲线上比较中国几乎是呈逆城市化的走势。这种情形一直到最近 20 年来才有所改变。改革以来城市化推进的速度明显加快, 2000 年城市化比工业化落后 14.8 个百分点, 差距比 1980 年减少了 14.3 个百分点; 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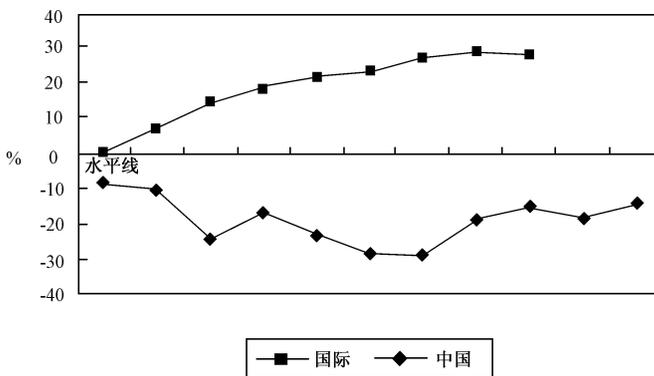


图 3 城市化与工业化之差的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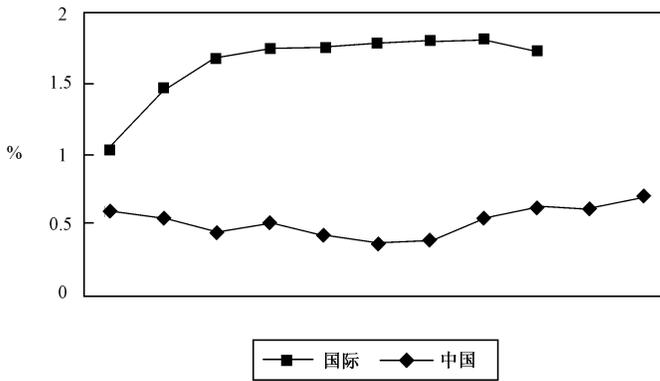


图 4 城市化与工业化之比的显示

表 4

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

单位: %

年份	产业结构			就业结构		
	I	II	III	I	II	III
1952	50.5	20.9	28.6	83.5	7.4	9.1
1955	46.3	24.4	29.3	81.2 [▲]	9.0 [▲]	9.8 [▲]
1960	23.4	44.5	32.1	82.1 [△]	8.0 [△]	9.9 [△]
1965	37.9	35.1	27.0	81.6	8.4	10.0
1970	35.2	40.5	24.3	80.8	10.2	9.0
1975	32.4	45.7	21.9	77.2	13.5	9.3
1980	30.1	48.5	21.4	68.7	18.2	13.1
1985	28.4	43.1	28.5	62.4	20.8	16.8
1990	27.1	41.6	31.3	60.1	21.4	18.5
1995	20.5	48.8	30.7	52.2	23.0	24.8
2000	15.9	50.9	33.2	49.0	24.0	27.0

注: ▲ 1957 年数; △ 1962 年数; I 为第 I 次产业; II 为第二次产业; III 为第三次产业。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0),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0 年版; 2000 年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数字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 200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 2000 年 2 月 28 日) 和劳动与社会保障部。

表 5

工业化、城市化水平的国际比较

	工业占 GDP%		城市人口%		人均 GDP (美元)
	1965	1995	1965	1995	
低收入国家	28	38	17	29	430
中等收入国家	34	35	42	60	2 390
上等收入国家	42	32	71	75	24 930
世界平均水平	40	33	36	45	4 880
中国	39	48	18	30	620
印度	22	29	19	27	340
泰国	23	40	13	20	2 7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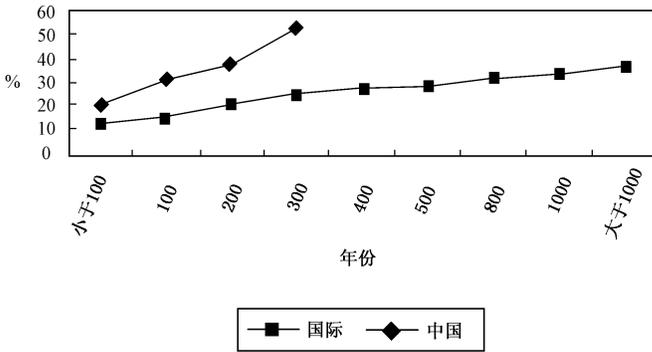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 1. World Bank, 1991,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 World Bank, 1997,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化与工业化的比值达到了 0.709，已比 1980 年高出 0.3 以上。然而直到现在我们尚有六成以上的人口滞留在农村，而按此时的工业化水平衡量城乡人口的比重应该颠倒过来才能达到国际平均水平。表 5 表明，1995 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 15 个百分点，而城市化水平也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 15 个百分点。

四、城市化滞后的原因分析

工业化速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脱节 —— 工业化速度的影响

上文的分析表明，中国的城市化略慢于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中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迅速推进工业化的。中国在开始工业化的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人均 GDP 按现价计算大约只有 50 美元左右，此后工业化的推进像脱了缰的野马几乎与人均 GDP 水平失去了联系：以 1960 年美元推算，按国际标准模式，当人均 GDP 为 100 美元时，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为 14.9%，而中国第二产业占 GDP 的比重则达到了 31% 左右，大约比国际标准模式高出 8 个百分点；当人均 GDP 为 200 美元时，国际标准模式的制造业比重为 21.5%，而中国相应的比例为 38% 左右，大约比国际标准模式高出 16.5 个百分点；当人均 GDP 水平为 300 美元时，国际标准模式的制造业比重为 25.1%，而中国相应的比例可上升到 53% 左右，大约比国际标准模式高出 28 个百分点，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参见图 5）。这个工业比重提高与人均收入水平上升相分离的特殊现象，所带来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影响之一便是工业化与城市化脱节，农民负担沉重，第三产业不发达。



数据来源：根据表 3 和表 4 计算绘制。

图 5 人均 GDP 与工业化水平

就业结构转换与产业结构变动相脱节 —— 工业化道路的影响

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动历程（参见表 4）。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与国际标准模式（我们选取最接近中国工业化历程的赛尔奎因—钱纳里结构变动模式为参照系，参见表 6）人均 GDP 100 美元时的情形相仿佛。以 1952 年为例，该年我国三次产业的产值比例为 50.5:20.9:28.6，国际标准模式为 48.0:21.0:31.0；三次产业的就业比例为 83.5:7.4:9.1，国际标准模式为 81.0:7.0:12.0。此后由于我国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全力推动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战略，因而三次产业的产值比例中以工业为主体的第二次产业的比重急剧上升，以农业为主体的第一次产业的比重逐年下降，惟有第三次产业的比

重变化不大, 50年增长了不到5个百分点。这一升一降以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的变动最为突出, 前后不过5年的时间, 第二次产业陡增20.1个百分点, 第一次产业急降22.9个百分点。问题在于同期的就业结构变动却不大, 直到1962年第一次产业的就业比重仍占82.1%, 第二次产业只有8.0%, 二者只变动1个百分点左右。按国际标准模式, 产业结构发生这么大的变动, 就业结构中第一次产业会下降20~30个百分点, 第二次产业会上升15个百分点左右。可见问题在这个时候就潜伏下来了。30多年以后, 到2000年, 我国三次产业的产值比例已变化为15.9 50.9 33.2, 按国际标准模式这个时期的就业结构中第一次产业应低于40%, 第二次产业大致占30%左右, 而我国相对应的就业结构为49 24, 差距依然很大。这么多年来我国只有第三次产业的产值比变化与就业比变化是基本协调的, 只是按国际标准模式衡量它的增长速度落后了许多。

表6

赛尔奎因-钱纳里结构变动模式

单位: %, 1980年美元

人均GDP	产业结构			就业结构		
	I	II	III	I	II	III
100	48.0	21.0	31.0	81.0	7.0	12.0
300	39.4	28.2	32.4	74.9	9.2	15.9
500	31.7	33.4	34.6	65.1	13.2	21.7
1000	22.8	39.2	37.8	51.7	19.2	29.1
2000	15.4	43.4	41.2	38.1	25.6	36.3
4000	9.7	45.6	44.7	24.2	32.6	43.2

资料来源: Syrquin, M. and H. B. Chenery, 1989, Three Decades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s* Vol. 3.

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人口城乡结构之间, 就业结构是个中介环节。就业结构随着产业结构发生变化, 人口城乡分布就比较合理; 就业结构不能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动而变动, 人口的城乡分布就会陷于一种失衡的状态。如前所述, 由于我国在人均GDP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就选择了一条以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道路, 并快速完成了产业结构的转换, 因而在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工业化水平特别突出, 20世纪70年代末期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就已经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但由于重工业占到了工业增加值的七成以上^①, 其就业弹性一般只及轻工业的1/3, 因而就业结构的转换慢了许多, 与产业结构相比显得极不相称。这便是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的国际经验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有力的印证的深层次原因。而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明显加快, 也正是得益于这个时期产业结构和投资体制的深刻变革所导致的就业结构的同步变动。

户籍管理与城乡二元结构

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条件下, 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发展战略的推行, 一方面加大了对农业的资金需求, 另一方面弱化了城市对农村的劳动力需求, 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促成了农村向城市单向“输血”的局面; 即由政府垄断农产品的流通以保障对工业和城市居民的供应, 并通过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来维持城市劳动力低工资水平下的充分就业。传统的户籍管

① 1952~1978年, 在工业结构中轻重工业的比例由66.8 33.2转变为29.4 70.6。

理制度正是适应这一需要而建立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度出现了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的局面，农村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城市则出现了食品供给紧张。针对这一严峻形势，也是为了在农业支持下尽快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政府在逐步确立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配套建立了一种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限制人口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早在1952年8月政务院就发出《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指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家还不可能在短期内吸收整批的农村劳动力到城市就业，因此必须做好农民的说服工作。1957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招用临时工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城市“各单位一律不得私自从农村中招工和私自录用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农业社和农村中的机关、团体也不得私自介绍农民到城市和工矿区找工作。”甚至规定“招用临时工必须尽量在当地城市中招用，不足的时候，才可以从农村中招用。”此类劳动用工制度只负责城市非农业人口在城市的就业安置，禁止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寻找职业。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第10条第2款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从此，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由于该户口制度的实施而受到严格限制。此后由于粮食短缺，不仅使得20世纪50年代城市快速发展的趋势中断，而且甚至出现“反向迁移”：60年代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城市先后有2000多万人和4000多万人被迫遣返农村。

改革以来农业经济形势迅速好转，农村人口也随之恢复了向城市流动的势头，但由于户籍制度依然横亘其中，像一堵无形的高墙将人口泾渭分明地划分为农民和市民两种身份，更由于这一制度同就业、上学、医疗、养老等社会福利制度以及国有产权益分配制度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加大了城市对农村居民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成了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实现身份转换的羁绊，以致在城市里迅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边缘人口阶层，不断冲击着现行的人口管理体制。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相应的试验也在全国不少省市逐步推开，预示着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套的人口管理制度行将被新的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人口管理制度所取代，新的制度将充分尊重人的平等性和流动性，适应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优化人口资源配置和人口信息化管理的客观需要，同时也是加快推进人口城市化的客观需要。

城市化滞后是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战略导致就业结构发生扭曲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它也会通过以下途径作用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使一个发展中的社会由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化异常困难，并直接影响到该经济的可持续能力：一方面，第一产业会因冗员过多而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提高，进而农民受比较利益低下的制约收入增长困难，农村市场贡献的能力也会因此而降低，而且农村社区的生态环境还会在日益增大的人口压力的作用下不断恶化；另一方面，第三产业因缺乏载体而长期得不到发展，直接影响全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和信息化水平。^①

五、我国已经进入城市化加速阶段

城市发展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是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推

^① 详细探讨参见李文《城市化滞后的经济后果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进的必然结果。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 (Ray M. Northam) 1979 年研究世界各国城市化过程所经历的轨迹, 将其概括为生长理论曲线——即著名的逻辑斯谛曲线 (Logistic Curve)^[4]。根据该曲线的描述, 可以将城市化全过程划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 (1) 初期阶段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 30% 以下)。这一阶段农村人口占绝对优势, 工农业生产水平较低, 工业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 农业剩余劳动力释放缓慢。因此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 城市人口比重才能提高到 30%。(2) 中期阶段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 30%~70% 之间)。这一阶段由于工业基础已比较雄厚, 经济实力明显增强, 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 工业具备了吸收大批农业人口的能力, 城市人口比重可在短短的几十年内突破 50% 而上升到 70%。(3) 后期阶段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 70%~90% 之间)。这一阶段农村人口的相对数量和绝对数量已经不大, 为了保持社会必须的农业规模, 农村人口的转化趋于停止, 最后相对稳定在 10% 以下, 城市人口比重则相对稳定在 90% 以上的饱和状态。后期的城市化不再主要表现为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过程, 而是城市人口内部职业构成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5]

中国在 1995 年的城市化率按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为 30%, 1990 年为 26.41%, 如将进城农村人口包含在内, 可以断定中国当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城市化率就已经达到 30%, 按上述逻辑斯谛曲线判断, 此后便进入了城市化加速推进阶段。其实自改革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就已经明显加快, 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 从 1952~1980 年的 28 年里我国城市化水平每年提高 0.248 个百分点, 从 1980~1999 年的 19 年里城市化水平每年提高 0.836 个百分点, 后者是前者的 3.37 倍。预计这一趋势会一直延续到本世纪中叶。在其他条件假定不变的条件下, 城市化的速度将主要取决于 GDP 的增长率和产业结构的变动率, 如前所述, 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占的比重越大, 非农产业的就业弹性越高,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城市化的推进就越快。此外, 城镇人口老龄化从而自身生产年龄人口减少所引致的劳动力需求增长, 也会导致人口城市化加速进行。

[参 考 文 献]

- [1] 霍利斯·钱纳里、莫尔塞斯·塞尔昆:《发展的格局 (1950~1970)》,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56 页。
- [2] World Bank, 1987,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3] 2001 年 11 月 6 日《中国信息报》第 1 版。
- [4] Ray M. Northam, *Urban Geography*, New York, 1979.
- [5] 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 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 第 332~333 页。

[责任编辑: 郑]

history. The use of the ‘Decade of Catastrophe’ is a sweeping and inaccurate term, and it is not an appropriate one for this historical period. To correctly sum up and draw lessons from Mao Zedong’s specific words and deed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e should regard them dialectically. Criticisms of predecessors should adopt an appropriately tolerant historicist attitude and should not be vindictive. To ensure that the Party and socialist government do not essentially change and that China realizes its national revival, we should always unwaveringly adhere to the 6th Plenum’s resolution on history.

Keywords: Cultural Revolution, Mao Zedong, exploring socialism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Deepening Grasp of the Laws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 WANG Qing-song(23)

Abstrac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grasp of the laws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has developed across time. From 1956 onwards China’s socialist construction recorded brilliant achievements, but it also experienced setbacks. Study of China’s socialist construction has grown from immaturity to maturity. This study has helped us to constantly deepen our grasp of the laws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Keywords: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ocialist construction, grasp, laws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Drafting, Revision and Amendment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I Zheng-hua(31)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drafting and three revisions and five amendments of the PRC’s Constitution. It analyses the intrinsic relations between these draftings, revisions and amendments, and it summarizes the main features of constitutional legislation and amendment in China. It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Constitution in building a socialist democratic polit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moting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regularization and routinization of this socialist democratic politics.

Keywords: Constitution, drafting and amendment, democratic politics

A Summary and Evaluation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in the Past Half Century LI Wen(41)

Abstract: Compared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models, China’s level of urbanization has been somewhat lower than its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eriously behind its level of industrialization. This is a product of China’s unique path of industrialization. Since the 1980s China’s rate of urbanization has markedly accelerated, reflecting the objective needs of the structure of industry and employment. This trend will continue in China until the middle of this century.

Keywords: China’s urbanizatio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models, structure of industry, structure of employment

Urban Modern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20th Century China QIU Guo-sheng(51)

Abstract: Urban Modern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re two aspects of historical progress which should mutually reinforce each other and develop together. But because after 1949 China’s modernization was launched in an extraordinary historical era, its urban modern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went through tortuous twists and tur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processes became opaque and complex. Only after the start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did urban modern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join a healthy shared course of mutual coordination.